

博雅史学论丛 / 中国史

经略幽燕

宋辽战争军事灾难
的战略分析



曾瑞龙——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博雅史学论丛 / 中国史

经略幽燕

宋辽战争军事灾难 的战略分析

曾瑞龙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1-414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曾瑞龙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

(博雅史学论丛·中国史)

ISBN 978-7-301-21464-0

I. ①经… II. ①曾… III. ①军事史-研究-中国-979~987

IV. ①E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2584号

©香港中文大学2003。本书由香港中文大学拥有所有版权。本版限在中国内地发行。

书 名: 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

著作责任者: 曾瑞龙 著

责任编辑: 张 晗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1464-0/K·090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67315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mm×1300mm 16开本 24.5印张 300千字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9.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經崎幽燕

序 言

学者研究宋代国势,常视为积弱,自宋初屡败于辽后,即无法达到大一统的目的。曾瑞龙博士从事军事史研究多年,对于中外战略、战术、战役、战争文化有很深入的探讨,因此他对北宋初年经略燕云的努力及其失败,是从大战略的架构来分析,并且对当时的每一战役都有讨论,从新的角度提出新的看法。他的这本书不仅让我们对于宋初的战争史有全盘的了解,而且对于宋初的立国大计,如强干弱枝的国策、先南后北的统一战争、重文轻武等课题,都有更深一层的启发。这本书不仅是研究宋代军事史的重要著作,也在传统中国史上有很大的贡献。

陶晋生

2002年7月16日

目 录

序 言(陶晋生)/i

绪 论/1

课题的意义与基本视角/1

战争史的观点与方法/2

概念与分析架构/8

个案讨论范畴、断限与研究回顾/25

本书主要论点/31

第一章 北宋军事失败的宏观解释:研究概况述评/43

北宋的大战略:以开国政策为中心的理解模式检讨/44

边疆民族与中原的战争:战略立体分析的必要性/62

结论/76

第二章 从强权政治到摸索规范:辽朝南疆大战略的转变/77

辽朝与中原冲突的强权政治背景/79

经略中原/89

对立中摸索规范:雄州和议(974)/97

结论/110

第三章 以北汉问题为核心的宋辽军事冲突/112

战争爆发的模式:理论框架/114

2 经略幽燕

冲突的升级与克制:第一个周期(960—967)/116

第二个周期(968—974)/124

北汉灭亡与宋辽战争的爆发/131

结论/141

第四章 内政导向与野战取向:北宋初年战略文化的落差 (960—986)/143

战略文化:理论框架与解释功能/144

对暴力的制约:北宋初年内政主导的大战略/153

战略文化的落差:五代宋初军队的野战取向/161

战略协调的可能性/178

结论/184

第五章 僵化军事信念指导下的高梁河战役(979)/187

“促师夺燕”:五代战略文化的余绪/188

士气问题/195

会战的发生/198

战术失误/202

宋军的败退/207

第六章 弹性战略防御的构建与满城会战(979)/212

何谓弹性防御?/213

宋初弹性战略防御的构建/217

个案研究:满城会战/226

瓦桥关之战/241

结论/246

第七章 战略脱节:宋太宗第二次经略幽燕(986)/247

大战略取向/251

战略形势/266

作战计划/277

结论/291

第八章 向战略防御的过渡:陈家谷与君子馆战役(986—987)/293

转入战略防御的宋军/297

陈家谷战役/303

君子馆战役:战略角度分析/311

君子馆战役:战役及战术分析/316

疮痍之卒/326

结论/332

结 论/334

军事灾难如何形成? /334

另类取向的可能性与战略文化的制约/336

前车之鉴:北宋 986 年以后战略转变的轨迹/346

征引书目/349

后 记/379

跋(罗球庆)/382

地 图

图一 969 年年末宋太祖围攻北汉及击败辽兵要图/126

图二 979 年宋太宗灭北汉要图/135

图三 宋辽高粱河之战示意图/206

图四 宋辽满城会战示意图/229

图五 曹彬攻取涿州及师溃岐沟关略图/286

图六 986 年潘美攻略山后要图/287

图七 陈家谷战役要图/309

图八 君子馆战役要图/316

绪 论

课题的意义与基本视角

本书研究的是中国近世具有深远影响的一次军事灾难,并企图透过战略认知架构重整北宋经略幽燕的历史经验。北宋经略幽燕的失败反映着宋初战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与大战略(grand strategy)的内在失调,特别是处于从五代到北宋的历史转折当中,旧有的军事信念与新的战争模式未能配合,使宋军在面对辽朝这个边疆民族政权拥有高度机动能力的军事力量时,遭逢出乎意料的挫败。经略幽燕的失败也反映出宋人想同时完成和平与统一两个战略目标之间的困境。宋太宗采取武力统一来解决这项两难,令原来文臣所提议的内政主导的大战略部署落空。在大战略没有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战役法和战术指挥变得举足轻重,而宋军开始不得不接受和擅长骑射的辽军在平原野战中一决高下的严峻事实。

战争史的观点与方法

本书属于战争史的研究范畴。在《波希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年代,战争史在历史这个学科中曾经占一重要席位。中国古代的史书如《左传》、《资治通鉴》也都花费大量的篇幅描写战争。战争是人类历史活动最激烈的场合,而传统的战争史也确有很多引人入胜之处。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冲突,最集中、最尖锐地反映在战争史上。战争的暴烈性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带来剧变,由纪元前至19世纪初仍有大量战役在一天中获得决定性战果,不但标志着王朝的盛衰和名将一生的毁誉,甚至可能决定着文明的命运。战争中微小的变数可以引起质的变化,其震撼人类心灵深处的程度,足以引发无穷无尽的争议。普鲁士军适时在滑铁卢(Waterloo)战场上的出现令拿破仑功亏一篑;南云忠一下令将“赤城号”甲板上的战机更换鱼雷和炸弹时受到美军俯冲轰炸机的攻击,以及“市场花园”作战(Operation Market Garden)中英军第一空降师在阿纳姆(Arnhem)巧遇前来休整的德军装甲部队。这些决定性的巧合并不容易解释,其所产生的戏剧性效果也有被夸大之嫌;然而无论如何,它们不但吸引了战争史的读者,也同时成为学术研究的素材。^①

^① 关于滑铁卢战役,较流行的有 John Keegan, *The Face of Battle*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76), pp. 117-203 的有关章节。此外,参 David G. Chandler, *The Campaigns of Napoleon*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66); Christopher J. Herold, *The Battle of Waterloo* (London: Cassell, 1967)。关于中途岛战役参 Mitsuo Fuchida and Masatake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first published in 1958, fourth printed in 1974)。关于“市场花园”作战,最为脍炙人口的当然是 Cornelius Ryan, *A Bridge Too Fa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4)。此书随后被改编为同名的电影,港译作《英雄冢》,据悉另一些华语地区作《夺桥遗恨》。此役较官方的观点,参 Kent Robert Greenfield, *Command Decision* (Washington, D. C.: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1960), pp. 429-42。参考德国方面档案写成的作品,有 Robert J. Kershaw, *It Never Snows in September: The German View of Market-Garden and the Battle of Arnhem, September 1944* (New York: Ian Allan, 1994)。

传统的战争史也集中体现了个人主观意志与外界条件局限性的冲突,以及意图征服世界或控制命运的悲剧。亚历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 356-323 B.C.)和汉尼拔(Hannibal, 247-182 B.C.)开始征伐时都只有非常有限的兵力,可是接二连三的成功,令他们开始相信自己或许能人所不能。在面对非常广阔的有待征服的空间,自我形象的膨胀使他们开始无视客观环境的局限性,构成了悲剧英雄的性格。他们征战的历史洋溢着个人向自然和命运挑战的高昂意志。伴随暴力而出现人性之中美德与劣根性的冲突,人如何面对成功与灾难,这些教训不容忽视。丘吉尔首相(Winston Churchill, 1871-1947)为其祖先马尔波勒公爵(John Churchill, the Duke of Marlborough, 1650-1722)所撰的传记、蒙哥马利元帅(Field-Marshal Montgomery of Alamein, 1887-1976)所撰的回忆录,及曼施泰因元帅(Erich von Manstein, 1887-1973)的《失去的胜利》,都流露着一种军人高尚的品格,在面对困难时百折不挠,在获得胜利时不矜不骄,都是值得世人效法的楷模。^①

然而今天在各种新兴的历史,如地方史、性别史、商业史和生活史的面前,战争史的地位似乎大不如前了。“我们不要战争,要和平”,这样的扬弃论者(abolitionist)想法是战争史日益失去支持者的一个原因。诚然,历史学家研究什么,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存在很大的关联。人们厌恶战争,或抱一种敬而远之的保留态度,是战争史日益远离主流学科的基本原因。可是这种看法也有不够全面之处。一方面,如李德·哈特(Liddell Hart)所说:“若你想要和平,便应了解战争。”^②冷战的时代虽

① Winston S. Churchill, *Marlborough: His Life and Time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68). Field-Marshal Montgomery of Alamein, *The Memoirs* (Cleveland: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58). Erich von Manstein, *Lost Victories* (London: Methuen and Co. Ltd, 1958); 中译本,曼斯坦(曼施坦因)著,钮先钟译:《失去的胜利》(台北:军事译粹社,1984年)。

② B. H. Liddell Hart, *Strategy*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td., first print in 1954; second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Praeger, 1967), p. 373; 中译本,李德·哈特著,钮先钟译:《战略论:间接路线》(台北:麦田出版社,1996年),页457。

然结束,但战争的危机并未离我们而去。和战争足以相提并论的暴力行为,如种族清洗和教派冲突仍然存在。中东、巴尔干、中非、南亚、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都属于万一处理失当,即很容易爆发战祸的地方。^①相对地能享受和平的,如欧洲、美国,都属于军事大国,或像日本那样受军事盟约高度保护及设防的国家。因此,在这时把战争史视作历史上的木乃伊,可能言之过早。

当然,正如柯恩(Eliot Cohen)和顾慈(John Gooch)所批评那样,军事史或战争史沦为学术界中较不受重视的领域,军事史研究者本身也有责任。军事史作为军人的集体记忆本来无可厚非,但太偏重于他们辉煌战绩的记录,却容易与社会脱节。撰写战争史的人,或过分强调其实用性而将过往战争的经验视为培养将军和参谋的教材;或过分根究战争背后的普遍原则,其末流之弊,往往陷入机械论和种种将复杂事情简单化的武断言论。^②

事实上,军事史/战争史的发展已必须强调科际整合,以扩阔视界,重新与人文社会接轨。传统以来以编年战争史、兵器史、兵种历史、军制史、团队史和军人传记为中心的研究范围,近年逐步随着科际整合而扩阔,出现了结合社会史、生活史,探讨军人的社会流动、社会地位和生活取向的作品。^③军队中的女性地位开始受到重视,而性别在军事文

① 有学者用“文明裂缝”来形容这些容易发生战争危险的地方,见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thin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7)。

② Eliot Cohen and John Gooch, *Military Misfortunes: The Anatomy of Failure in War*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0), pp. 35-37.

③ Walter Millis, *Military History* (Washington: Service Center for Teachers of History, 1961). Adam Yarmolinsky, *The Military and American Society* (Philadelphia: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73). Hamilton I. McCubbin, Barbara B. Dahl, and Edna J. Hunter (eds.), *Families in the Military System*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76)。

化中的角色也成为一些作品的焦点。^① 军事理论、国际关系和文化研究的结合产生战略文化的研究领域。^② 从实用的角度,军事史/战争史还可以结合系统理论产生对军事灾难的研究。^③ 此外,得到情报学的辅益,战争史也孕育出战略欺骗的研究。^④ 这些倾向若能进一步加强,将有助于加强战争史与其他主流学科的沟通。

然而最根本的就是与战略研究维持联系,整合理论和史实的知识,令两者可以互相依存。史实修正理论,而理论则可以提醒研究者,对容易忽略遗忘的空间保持较高的警觉性。正如史实亦系乎新证据的发现而修正一样,从事科际整合并不代表认为世上存在永恒正确的理论,学者不应存有勉强迁就任何一方的想法。引进理论不是因为其绝对正确无误,而是因为理论和事实都作为知识的一部分,具有在一定证据下相对的真确性。我们对片段和零碎的事实感到满足,完全可以理解;但如果要将片段连贯起来形成具分析意义的体系,则理论化(theorization)是不可避免的步骤。其实任何理论都建基于一些假设,而这些假设背

① Bok-Lim C. Kim, *Women in Shadows: A Handbook for Service Providers Working with Asian Wives of U. S. Military Personnel* (LaJolla, Calif.: National Committee Concerned with Asian Wives of U. S. Servicemen, 1981). Laurie Weinstein and Christie C. White (eds.), *Wives and Warriors: Women and the Milita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Westport, Conn.: Bergin & Garvey, 1997). 蒋竹山:《女体与战争——明清厌炮之术“阴门阵”再探》,《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页159—187。

② Colin Gray, "National Styles in Strategy: The American Examp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6:2 (1981), pp. 21-47. Carnes Lord, "American Strategic Culture," *Comparative Strategy*, 5:3 (1985), pp. 269-93. Jack Snyder, "The Concept of Strategic Culture: Caveat Empor!" in Carl G. Jacobsen (ed.), *Strategic Power: USA/USS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 pp. 3-9. David R. Jones,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n Carl G. Jacobson (ed.), *Strategic Power: USA/USSR*. Yizhak Klein, "A Theory of Strategic Culture," *Comparative Strategy*, 10:1 (n. d.), pp. 3-23. Shu Guang Zhang,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 Chinese-American Confrontations, 1949-1958*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③ Cohen and Gooch(上页注②)。

④ Donald C. Daniel and Katherine L. Herbig (eds.), *Strategic Military Deception*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81);中译本,唐纳德·丹尼尔、凯瑟琳·赫伯格主编,徐晓军、扈新生译:《战略欺骗》(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

后存在一个认知的典范(paradigm)。据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的意见认为,真正的分别,不在于是否接受理论,而在于自觉与不自觉地接受了某种理论假设。^①这说明了理论假设对史实的认知具有难以忽略的过滤作用。^②

使用战略的概念架构不等于照搬现代的战略主张。特别是出现了核武器,达致互相确保摧毁(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简称MAD)之后,现代的战略主张如威慑战略、空中战略等,和古代的战略相比确实呈现不同的面目。现代战争史家已很少相信有亘古不变的法则存在,世上也不是只有一种真理。因此,在运用战略的分析架构之余,也要警觉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不利影响。战争史家应当具备一分醒觉,既清楚战略的分析架构是认知体系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而同时尽量避免这种认知的历史局限影响结论的精确性。本书引用理论,目的是提供分析架构,比如借用战略文化的观点,就考虑到战略的社会化,及意识形态、习俗及价值观渗透入战略决策,这种做法不会是西方世界的专利。至于某些论述需要引用一些战略原则,也考虑到其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而不是局限于特殊火力、机动力等技术条件的产物。^③

战争很少能离开战略。远古先民为了争夺基本的生存条件而乱打一气,可能不存在所谓战略;可是当战争日趋复杂化而产生有系统地趋利避害的想法,广义上战略的思维就已存在。正如克劳塞维茨(Carl

① Robert O. Keohane, "Realism, Neorealism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26.

② 例如研究美军在珍珠港事件的情报失误是如何地不可避免,这个论题是以军事突然性的理论作为认知典范的。然而我们一旦改采战役情报学(operational intelligence)的观点分析,就会发现直至日军发动攻击之前的五分钟,事情还不是无可挽救。Cohen and Gooch(本书第4页注②), pp. 47-56.

③ 书中间或举出某些古今战史的例子,说明套用有关理论时宜有所分别,例如下文提到1940年法兰西战役和1941年巴巴罗萨(Barbarossa)战役都是闪击战的最佳例证,只为说明所谓“战役层次”的含义,但并未套用闪击战的理论来解释宋辽战争。

von Clausewitz)所说,战争是政治在另一方式上的延续。当出现了这种具有政治意味的战争,它就离不开作为一种政策而存在,而如何推行政策,就很容易带出战略思维。因此即使不同年代的个案虽然对是否使用战略的字眼不相一致,但从其内涵分析,仍然可以判断战略思维的广泛存在。

战略提供一个立体而全面的分析架构,从技术、战术(tactics)、战役法(operational art)到大战略,每个层次可以有不同的取向,而又发生互动。具备这个分析架构,可以了解单纯技术观点的不足之处。当然,技术是战略的一个层次,而史家对于长弓的发明和火药的西传所发生的关键作用,都已给予了充分的评价。^①可是军事技术发展史远远不等于战争史。重大的技术发明,其影响往往不仅限于技术层次,它还带来战术的变革,甚至出现相关的战役法和大战略。因此,发明某种武器的国家是否能利用该种武器以取得军事优势,要视乎它在整个战略架构上如何将它定位和作出各层次的配合。

利用战略的流变来阐述战争,凸显了战争理性和有秩序的一面,有助于去除芜杂,予人层次分明的感觉。当然,战争的本质能否从理性和秩序去理解,可以成为一个争论不休的课题。战争是一种暴力的表现形式,本质上具有破坏秩序的特性,然而战争除了无秩序的一面之外,它还是一种有组织的暴力,并且有秩序的一面,而战略就是为这种暴力的秩序提供一种规范。战争史若纯粹表露无秩序暴力的事实而不加剪裁,则只能做到史料,而非史书的层次。以战略为主线描写战争,虽然不能反映事实的全部,但能突出其规范演变的轨迹。当然,是否采取这

^① Robert Hardy, *Longbow: A Social and Military History* (Cambridge: Stephens, 1976). John Francis, *Guilmartin, Gunpowder and Galleys: Changing Technology and Mediterranean Warfare at Se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Joseph Needham, *Gunpowder as the Fourth Power, East and West*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5).

个角度,要视乎史家在了解其局限性之后,是否愿意突出这种轨迹。对于某些已经被建构得相当可观的个案,研究者或会觉得对战争无秩序非理性的一面的描述,有助于了解事情的原貌。然而对于反复错乱、记载芜杂的个案而言,战略就是一条重塑认知的线索。

为了避免过分强调战争的理性一面,在引进战略理论的同时,也应该引进战略文化的研究角度,互相补充。研究战略文化的学者们认为战略决策的产生,不只是一个以客观环境为依归的理性取向,而是决策者受文化传统、历史因素所局限之下行为的体现。正如克莱因氏(Yitzhak Klein)在一篇揭橥战略文化理论的文章中指出,战略决策是对战争的一种主观判断(subjective judgment),因此不同的军事组织、国家或民族对待暴力、战争的方法都可各有不同,而形成战略思维多元化的现象。^① 军事决策者们赖以制定战略之种种不同风格的信念,就成为战略文化的研究目标。从事战略文化研究的学者们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战略文化可以对不同国家、军队的战争行为提出更全面的分析。研究战略的同时研究战略文化,可以避免过分强调战争的理性一面,从而深入观察其与文化价值体系的互动关系。

概念与分析架构

1. 战争

人类自有战争以来,有识之士对它的本质所下的注脚不可胜纪,要一一追溯他们对战争的定义,显然并非本书所能胜任。这里所要特别强调的是昆西·莱特(Quincy Wright)在其名著《战争研究》(*A Study of War*)所下的定义。他认为战争从广义而言,可以泛指“同类但判然有

^① Klein(本书第5页注②)。

别的实体之间所进行的暴力接触”；至于较狭义和专门化的定义，则为“同样地容许两个或以上敌对团体进行武装冲突的合法状况”，这个定义专指现代政权之间的战争。^① 观乎两者之间，其中最重要的分别就是“合法”的观念。在现代的国际关系中，战争是形容一种法律状态，宣告一个国家可以合法地向另一些国家使用暴力。在军事行动中，士兵可以消灭任何构成威胁的目标。当然，这种合法性的容许范围也是有限度的，犯了杀死手无寸铁的平民、虐待俘虏及种族灭绝等行为，现在会被送上军事法庭，甚至国际法庭。在种种对暴力使用合法化的过程中，宣战是一项重要的程序。虽然合法并不意味着公正，循正当的宣战程序开战也并不代表这必然是一场正义战争（just war），可是不宣而战，或在宣战程序中偷步，却一定被认为违反道义，日本海军在偷袭珍珠港事件中引起广泛回响，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②

不少事例说明，莱特对战争所下的较狭窄的定义，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同样适合古代中国的战争研究。中国上古政治高度礼仪化的传统，令官方对于暴力的使用是否合法具有敏锐的触觉。兵被认为是刑的一种，而朝廷在命将出师的时候颁授斧钺，也象征了这种暴力合法化的程序。六朝时的都督有使持节、持节和假节之分，^③唐朝称之为节度使，都是这种使用暴力的特许权在官制上的反映。朝廷对于进行战争的对象有时是敌对政权，有时是部族或叛乱集团，几乎都经过下诏讨伐的程序。当时尚未有国际法的观念，不一定能找到国际社会公认的依据，因此不得不努力寻找道德根源，如诏中多指责对方的禽兽行为天地不容，不免用一种中心主义的观点，将本国圣贤的道德扩大为放之四

① Quincy Wright, *A Study of War* (2nd e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p. 8.

② 有关正义战争的观念，参 Michael Walzer, *Just and Unjust Wars* (Harmondworth: Penguin, 1980).

③ 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卷二四《职官志》，页729。